

举办五七干校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张绍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1968~1979年举办五七干校强烈地冲击了高等教育, 导致众多高校及其教职工大规模地涌向农村, 陷入颠簸状态; 造成一些高校及其教职工的资产损失严重, 大量建设资金被挤占; 也致使一部分高校被撤销, 师资大量外流, 高等教育规模缩小; 并酿成不少悲剧, 使许多高校教师身心俱损, 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关键词] 五七干校; 知识分子改造; 高等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1)03-0074-05

五七干校是1968~1979年在毛泽东五七指示指引下举办的干部学校。这类学校大多直接冠名“某某五七干校”, 但也有一些使用了其它名称, 如“五七学校”、“一〇五干校”、“试验农场”等。区别一个单位是不是五七干校, 关键是看它是否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素: 第一, 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办学指导方针, 或者讲, 是在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名义下办起来的; 第二, 以干部为主要教育对象(在中国, 公办教师属于专业技术干部)。如果二者兼备, 则是五七干校; 反之, 则不是。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作出的指示, 主要内容是: 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 都要一业为主, 兼学别样, “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1]。1968年5月7日, 黑龙江省革委会下放部分干部,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肯定了这种做法。10月5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与该文绑定在一起的是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2]。潘多拉的盒子由此打开, 全国迅即刮起“下放干部, 举办五七干校”的风潮, 不仅党政机关纷纷卷入其中, 而且高等院校也被强行挟入其中, 高等教育事业为此而深受影响。

一、使众多高校及其教职工大规模地涌向农村

五七干校通常办在农村。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布之后, 国内高等院校只得作出响应, 相当一部分高校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尤其是1969年10月26日《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发布后, 更是掀起了办五七干校的高潮。高等院校办五七干校的特点可概括为来势快、规模大、力度强。规模大不仅体现在办五七干校的高等院校多, 而且体现在下放至五七干校的高校教职工多。下面这些材料和数据主要是从一些高校的校史中撮取出来的, 尽管只是部分高校的, 但足以反映和证实上述史实。

1968年10月, 复旦大学校革委会决定到农村办五七干校, 让干部分批离校去劳动改造。随后在崇明县东风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3]。

同月, 西北农学院将200多名教师、干部下放到农三站劳动锻炼, 成立五七农场, 1970年10月改称五七干校[4]。

1968年11月, 中山大学430名教职工被下放到乐昌县坪石公社天堂大队办五七干校。12月, 又有700多名教职工被下放到这所干校[5]。

1968年11月, 广东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工下放阿驼岭五七干校劳动, 接受“再教育”[6]。

同月, 华东师范大学203名干部、教师下放五七干校。1970年2月, 该校决定在江苏省大丰县隆丰草原建立自己的五七干校, 派出50名干部、教师组成先遣队, 先去垦荒建校。6月, 第一批干部、教师200多人进入干校。至1971年3月, 有156人返回了大学, 但仍有305人留在干校。之后, 干校被迁往上海市奉贤县[7]。

1968年, 广东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下放英德茶场五七干校劳动[8]。山东农学院在白马河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9]。

1969年5月，北京邮电学院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成立五七干校选点工作组，赴山西、湖北、河南等省选点，历时3个月，最后确定在河南省确山县办五七干校。1969年10月，派去300多人组成的先遣队，运去大批物资，并购置了各种农机具。至年底，有上千名教职员到达五七干校。干校人数最多时有1500人[10]。

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木兰县东兴镇创办五七干校。全校80%左右的教师、干部陆续下放到这里“劳动锻炼”[11]。

10月25日，中央民族学院734人前往湖北省潜江县沙洋农场办五七干校[12]。

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及938名家属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在那里办五七干校[13]。

1969年11月，北京体育学院教师、干部及家属476人被遣送到山西屯留国家体委五七干校劳动[14]。

从1969年11月15日起，北京地质学院1000多名教职工举家带口、扶老携幼，被送往江西省峡江县仁和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1972年，干校又迁往湖北沙洋[15]。仅在湖北沙洋农场一地，就至少有9所高校在此举办五七干校，分别是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武汉钢铁学院和武汉农机学院。

1969年11月，郑州粮食学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家属被迁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公社，在那里举办五七干校[16]。

同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5000多名教职工被下放至江西省鲤鱼洲试验农场，在那里劳动，走“五七道路”[17]。该机构虽然名为“试验农场”，但实为五七干校。它完全具备了五七干校所应具备的两大要素。这些教师大多自称为“五七战士”。

1970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在大荔县朝邑三门峡库区办起了五七干校，干部、教师被轮流派去参加劳动，每期半年左右，共办16期，约有1200人次参加[18]。

3月，广东省革委会通知中山医学院成立五七干校。该校大批教职员先后到设于英德县、连南县、连山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5]。

5月7日，北京师范学院在北京104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全校教职工（老弱病残者除外）及1965级学生陆续进入这所干校。干校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19]。

1975年，甘肃农学院在附属农场建立五七干校，组织教职工轮流去“接受再教育”。1977年干校才停办[20]。

仅从上述材料就能发现，“文革”时期确实有许多高校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在这股风潮中，另外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将教职工下放到其它单位的五七干校。这种劳师动众的举措造成众多高等院校及其教职工不是向办学条件更好的地方迁移，而是向办学条件更差的农村迁移；不是过渡到安定、正常的状态，而是陷入颠簸、扭曲的状态。

二、造成一些高校及其教职工的财产损失严重，建设资金被挤占

举办五七干校的过程就是劳民伤财的过程。其间，一些高校的财产损失严重，甚至有的高校校舍被其它单位占用。北京邮电大学校史记载：当时“校园设备和个人财产都受到很大的损失”[10]。中国地质大学校史记载：“在仓促的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教职工失去了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丽的校园被蚕食、侵占”[15]。再如，1968年广东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下放五七干校，“原校舍场地被工厂占用”[8]。许多高校教职工因下放五七干校而只得将私人物品如家具、图书等迅速贱卖，个人财产损失也很大。北京医学院教师李学愚回忆：教师“首先是变卖家当。1969年10月，北京各大单位和大专院校都在筹备前往‘五七干校’，整个北京似乎都浮动起来，旧货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我同北医的一些准‘五七战士’一起，借来平板三轮，把大件家具拉出去卖……好不容易蹬到商店门口，却要排队等候……价格压得很低。记得我拉去的一个大衣柜，是硬木材质，上有精制的雕饰，

是夫人家里的老古董，结果才卖了 15 元人民币……因为来处理家当的人太多，旧货商店应接不暇，直到有的地方拒绝收货。所以，当时北京旧货商店门前堆满了旧家具和书籍等一应物品，成为一景。” [21] 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张耘回忆：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办五七干校而将“所有的门，教学楼的、宿舍的全封了。许多教员把家具都卖了，以为回不来了。从通知去干校，到出发仅有三四天时间。” [22]

为了建立和维持五七干校，高校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耗费了大量物力和财力，像车旅费、货运费、房屋建筑费、维修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费、工业生产资料购买费等等开支都很大。当时只算政治账，不计成本，这就使高校的摊子越铺越大，战线越拉越长，资金分散，浪费严重，高校自身建设滞后。仅以北京地质学院（1972 年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为例，为办五七干校，该院教职工两次搬迁，第一次从北京搬到江西峡江，第二次从江西峡江搬到湖北沙洋。有关档案显示：在第二次搬迁中，该校支出 1 000 多人的车旅费（含火车费、汽车费、轮船费、住宿费、途中补助）30 900 元，支出物质装运费及其它费用（含零担慢件费、快件费、包火车皮费、船运费、汽车运费、搬运费等）75 447 元。到湖北沙洋后，由于已有住房是蓆棚结构，有的破烂不堪，有的东歪西倒，且饮水困难，该校又不得不投入 62 462 元紧急维修草房、蓆棚、牛棚和打机井。之后由于旧蓆棚每年都需维修，费钱费力，又不能隔热和防潮，只得再投入 168 000 元用于新建砖瓦结构的宿舍（200 间）、食堂、仓库、中小学和幼儿园 [23]。以上开支只是该校办五七干校开支的一部分。可想而知，全国众多高校办五七干校必然开支庞大，必然影响到高校自身硬件建设。

三、使一部分高校被撤销，师资大量外流

办五七干校接踵而至的是一些高校相继被撤销，高等教育规模随之缩小。例如，197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办五七干校的过程中接到北京市革委会发来的停办通知。北京市革委会原计划将就地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交由江西省革委会处置，而江西省革委会拒绝接收，理由是该校老干部多，高级知识分子多，工资级别高。北京市革委会才不得不将该校教职工撤回北京分配。截止 1973 年 7 月，该校 1 400 多名教职工基本上按块分配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文教卫生系统，约 160 人分配到外省市家庭所在地，学校附属单位也成建制地移交给北京市有关单位。这样，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莫名其妙地被拆散、停办了 [13]。直到 1978 年，该校才得以复办。再如，1969 年 5 月 15 日，广东民族学院在办五七干校的过程中被明令停办 [6]；1970 年，广东教育学院、暨南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等高校在办五七干校的过程中被明令撤销 [8]。在办五七干校的过程中撤销部分高校，直接导致高校数量减少。北京市 1965 年共有各类大学 55 所，1970 年减少至 24 所，1972 年减少至 18 所 [24]。中央部属学校文革前有 176 所，到 1971 年 7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只剩下 131 所 [25]。原因之一就是办五七干校的过程中撤销了一些高校。其间，还有大批教师从五七干校外流到其它单位。例如，1971 年春，北京邮电学院五七干校开始对下放教职工重新分配工作，“第一批分到电信总局所属的广西、山东、湖北、江西等邮电工厂工作，后又陆续分配到有关省市，这些教职工大部分是学校骨干力量，造成学校人员的流失” [10]。

四、使广大高校教师身心受损，酿成许多悲剧

五七干校大多办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这对高校下放教师的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如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教职工下放劳动的鲤鱼洲就是血吸虫病高发地区，两校许多教职工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有的夫妻双方加上孩子都染上这种病，以至于 1971~1972 年北京大学不得不腾出九、十公寓和专家公寓作为血吸虫病人集中治疗的场所 [26]。五七干校创办初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北京邮电大学校史记载：“开始到达确山县，无房无电无水，生活非常困难，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棚里，男女分住。家属就更受苦难，老老小小有的还有病在身，住在用蓆搭的过去的猪圈房子里，不但寒冷潮湿，而且还不挡风，且有猪留下的臭气。刚到

确山时，用水也很困难，水要用白矾沉淀后才能饮用，洗脸用黄汤水，洗澡更是奢望。”[10]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五七干校中普遍存在着，极易引发和传染疾病。由于五七干校片面地强调越苦越累越能考验人，一味地强调大干、苦干和蛮干，所以干校里体力劳动的强度很高，许多重体力活超出了教职工的身体承受极限，致使许多教职工从此落下了病根。

身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摧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广大高校教师是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下放五七干校的，已彻底地由教育者沦为改造对象和被教育者。在五七干校，“大批判”被作为动力贯穿始终，用得很普遍，许多高校教师一次次地横遭批判、批斗。北大的教师回忆：“在鲤鱼洲，教师们挨批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因看不惯，或因为憋不住，做不到沉默不语，随便说话，结果常引来灾祸，轻则在队前点名批判，重则批斗加体罚。”[27]尤其是五七干校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致使许多高校教师遭受迫害，蒙受冤屈，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北京体育大学校史记载：下放五七干校的“这批同志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还不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14]河南工业大学校史记载：“在确山县，主要是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运动’，对一些教职工进行‘立案审查’、关牛棚。指挥部把‘有问题’的干部、教师分配到各系、各班接受批斗”[16]。北京邮电大学校史记载：“军宣队在干校、正定和北京三地共办重点清查对象学习班 28 个，其中涉及教师、干部 13 人，学生 13 人，工人 2 人。在清查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和指供、诱供、抄家、打人、体罚等一系列错误做法，甚至多次组织群众性的批斗大会。”[10]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回忆：经济系很有才华的教师陈秋梅在五七干校被莫须有地定为“五一六”分子而接受严格审查，“最后竟以死来抵制这场运动，第一次自杀是用剃须刀割喉咙，没有成功，被草草包扎，第二天又去接受批斗”，于是他第二次自杀而亡。“没有人为他的死负责，反而诬他‘畏罪自杀’。不久他的老婆也病死了，留下两个女儿，这个家就这样被毁灭了”。“经济系老教授项冲是党外民主人士，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大概是审查他的‘海外关系’，总也通不过，最后被逼得上吊自杀。一位后勤干部……受不了这种审查和反复批斗，最后也自杀了。”[28]五七干校开展的政治运动和“大批判”破坏力之大由此可管窥一斑。它使得许多高校教师更加苦闷和彷徨，一度对知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前途缺乏信心，甚至有的哀叹“入错门”、“搞错行”、“教师没当头”。

五、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

进五七干校对高校教师来说，意味着要离开自己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由从事脑力劳动转向从事他们并不熟悉的体力劳动，尤其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一些教授由此变身为“鸭司令”、“羊司令”、“猪司令”等等。在五七干校里，开展教学科研的条件基本丧失，教师如果钻研专业和技术，往往会招来“不突出政治”的批判。这远不止是有辱斯文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糟蹋人才、浪费人才。一方面，人才得不到尊重，被当作废品一样地处理，已无用武之地，难出教学科研成果，许多人宝贵的时光和精力就荒废在五七干校里。另一方面，又给这一时期国家的人才培养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扰乱了高等院校的教学秩序，使高等院校少培养了许多高级人才，而且培养质量较差。当时许多高校的教学方式深受五七干校的影响，一窝蜂似地办起了五七农场、五七工厂或五七试验班，聘请了大批工农兵兼职教师。复旦大学于 1969 年 9 月办起了“五七文科试点班”，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大批判为武器”，彻底推翻原有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 [3]。高校恢复招生之初，许多教师还只能有五七干校里一边劳动，一边给工农兵学员上课。“只有没有问题的人，才能去教书。半天种地，半天教课，算是好的待遇。别的人还是去大田干活，劳动改造”[29]。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七干校，教师被要求教外语不能再用从音标教起的办法，而必须按所谓的“教改方法”即从教“毛主席万岁”这句话教起的办法来教外语。邓小平对举办五七干校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据跟随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新华社记者班玮报道：1979 年 1 月 30 日，美国总统卡特举办国宴，招待访美的邓小平一行。席间，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告诉邓小平，几年前

她曾到中国农村参观五七干校，问一位正在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得到的回答是：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学到很多东西。闻听此言，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马上正色说道：这位教授在撒谎；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实事求是和尊重人才的态度当即给身旁的宾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0]。次月，国务院发布通知：五七干校在全国范围内停办。显然，这一决定是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举办五七干校造成了人才资源极大浪费等一系列负面影响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项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1968~1979年举办五七干校强烈地冲击了高等教育，导致众多高等院校及其教职工大规模地涌向农村，高等教育陷入颠簸状态；造成一些高校及其教职工的财产损失严重，大量建设资金被挤占；致使一部分高校被撤销，师资大量外流，高等教育事业规模缩小；并酿成许多悲剧，使许多高校教师身心受损，一度无法进行教学科研工作，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尽管高校教师在五七干校学会了一些农业、工业生产技术，意志品格得到了磨砺，但总体上来说，举办五七干校对当时高等教育事业无异于一场灾难、一场浩劫。这段历史留下的最大教训是：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只有遵循教育规律，才能办好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54.
- [2]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N].人民日报,1968-10-5(01).
- [3] 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委会.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98-323.
- [4] 关联芳.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23-124.
- [5] 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296,320.
- [6] 吕奎文.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校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7.
- [7] 袁运开,等.华东师范大学校史(1951-2001)[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1.
- [8]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教育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16.
- [9] 山东农业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农业大学校史(1906-1990)[M].泰安:山东农业大学,1992:266.
- [10] 北京邮电大学校史编委会.北京邮电大学校史(1955-2005)[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138-142.
- [11] 杨奔.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4-115.
- [12] 荣仕星.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89.
- [13]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编写组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史资料[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2:357-358.
- [14] 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编委会.北京体育大学校史(1953-2003)[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66-69.
- [15] 赵鹏大.励精图治五十秋 中国地质大学简史[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179.
- [16] 河南工业大学校史编写组.河南工业大学校史(1956-2006)[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7.
- [17] 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N].人民日报,1971-05-09(01).
- [18]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校史编写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校史(1955-1984)[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91.
- [19] 首都师范大学志编写组.首都师范大学志(1954-2003)[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6:125.

[20] 甘肃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甘肃农业大学校史[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3.

[21] 李学愚.“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A].唐筱菊.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17.

[22] 张耘.大自然的孩子 [A].贺黎,杨健.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359.

[23] 湖北地质学院.关于申请五七干校搬迁及修膳经费的报告 [Z].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 1972-5-30: SZ118-4-121.

[24]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计划志 [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122.

[25] 蔡翔等.20 世纪中国通鉴 3 [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706.

[26] 贺黎,杨健.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346,353.

[27] 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91-200.

[28] 刘炼.余江五七干校生活 [A].唐筱菊.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20—221.

[29] 王琦.鲤鱼洲跳龙门 [A].贺黎.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353.

[30] 班玮.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重温邓小平访美历程 [N].经济参考报,2004-08-23(07).

On the Influence of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

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ZHANG Shao ch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81, China)

Abstract:From 1968 to 1979,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 had intensely attacke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irst, it resulted in man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rushing the countryside. Second, it caused heavy property losses of some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Third, it led the closure of some universities, a considerable brain drain and the red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cale. Fourth, it bred a lot of tragedies to a lot of teachers and caused the wast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declin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Key words:May Seventh Cadre School;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sia; higher educ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李震声)